



文艺的源头活水永远在人民

近年来,一个充满活力与创新的概念——新大众文艺,逐渐进入公众与学界的视野,成为我们理解当代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人民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注脚。这股浪潮不仅是媒介技术变革的产物,更是时代深沉的召唤。

新大众文艺之“新”,其实接续的是一个悠久而古老的传统。回到文艺最初传统来看,在专业体系尚未建立之时,正是普通大众对内心世界表达的渴望,生发出了诗歌等艺术形式。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冲动,与文化程度、职业身份等外在条件无关。正如中国古代的“诗三百篇”并非仅是文人雅士的创作,而是包含了大量的民间歌谣,生动展现了文学从民间、从“野地里”生长出来的巨大生命力。

这一大众化的文艺脉络,在历史长河中始终清晰: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新白话文学推崇“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20世纪30年代,左联倡导“文艺大众化”,呼吁

文艺积极担负起唤醒民众、拯救国家的责任……这些都是大众文艺在不同时代的深刻反映。新大众文艺的出现,正是在新媒体语境下,对这一历史主题的深沉呼应。

今天,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让人民大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文艺的生产、传播和互动。“人人皆可创作,处处皆为现场,人人都能传播”,无数普通劳动者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他们的日常经验以及内心深处的强烈呼唤,共同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新大众文艺时代大观。这些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文艺作品,带着生活的温度、痛感与哲思,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和塑造着这个时代的文艺形态和审美趋势。

新主体的涌现,是这场变革最鲜活特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博主……他们不再仅仅是文艺的被描绘者,而是主动的言说者。这几年,广东东莞涌现出一批“素人写作者”,他们以作品书写

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被誉为新大众文艺典型样本,备受关注。诗人温雄珍只是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的一员,这位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童装店主、烧烤摊兼职者,用她的诗歌完成了从日常到精神的升华。她没有“专业诗人”的身份,却以无比的真诚和深刻,将对生活、对母亲角色、对童装店与烧烤摊的理解,转化为富有质感的诗句。她的创作源自真实的个体经验和生活痛感,具有强烈的“在场性”和质朴的初心。正是这些亿万普通人的真实心声,构筑起一幅丰富的时代精神图谱。

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再次证明了文艺的源头活水永远在人民。这不仅丰富了文艺形式与内容本身,也给“专业作家”“专业诗人”带来深刻启示:文艺创作归根到底是一种劳动,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对理想和诗意的内在召唤。只有扎根大地、情系众生,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艺作品。

据《人民日报》

跨界配音同样要拿出专业态度

近日,《疯狂动物城2》的热映,让影视配音这一话题再度跻身舆论焦点。明星演员配音阵容曝光之初,“声音与角色割裂”的担忧声不绝于耳,也让“配音演员是否还有存在必要”的讨论浮出水面。在原声影片成为主流选择的当下,这种争议恰恰折射出观众对配音艺术的更高期待——配音从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专业支撑的艺术创作。

质疑配音价值的声音,往往忽略了部分群体的实际需求。影院排片数据显示,每逢周末亲子观影高峰,中文配音场次便会适时增加,老人与孩子构成了核心受众。对不识字的孩子而言,生动的配音是理解故事的桥梁;对视力衰退的观众来说,清晰的台词传递比字幕更直接。这些场景下,配音演员承担着文化传播“摆渡人”的角色。译制片与专业配音的存在,本质上是影视艺术走向更广泛受众的必要补充。

而观众对配音演员的“不买账”,折射出大众审美水平的飞跃和对影片艺术完整性的更高要求。配音不只是信息的翻译与传递,观众渴望的是声音与角色的深度融合。在专业配音演员看来,优秀的配音绝非念台词般简单,它是一门需要精湛技艺的再创造艺术。配音演员需要具备独特的声音条件、精准的角色分析能力、细腻的情感投射功力,让声音为角色注入生命,而非让观众产生“两张皮”的疏离感。此次《疯狂动物城2》关于配音的争议,正是观众对那种仅靠明星光环、缺乏角色神韵的配音方式亮起的红灯。

放眼国际,一些动画电影中的角色配音也由明星担任,但为何能实现配音的“锦上添花”?皆因其对配音专业性的尊重。许多知名演员将为动画角色配音视为严肃的艺术创作,倾注心力去揣摩、贴合角色,其配音表演本身已成为影片魅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内也不乏优秀先例,有演员以其极具辨识度且富于表现力的嗓音,在表演之外成功塑造了多个经典的配音形象,证明了“声技”与“演技”可以相得益彰。但部分明星跨界配音时,未能充分投入对角色内核的理解与声音塑造,使得效果流于表面。

明星跨界配音并非不可行,但前提是拿出专业态度。一旦涉足配音,就必须秉持对艺术的敬畏之心,交付专业的素养与诚意。片方在选择配音演员时,更应首先考量其声音表现力、角色契合度与专业态度,而非单纯追逐流量效应。无论是专业配音演员还是跨界明星,为角色服务都应是唯一准则。

据《中国文化报》

民族舞蹈可记录历史也可讲述时代



民族舞蹈不仅是历史的存档,更通过肢体语言对民族文化进行创造性演绎,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傣族《雨祭》、土家族《摆手女儿家》保留祭祀遗韵,蒙古族《战马》、藏族《阿嘎人》、朝鲜族《谷雨》将生活经验升华为艺术审美,维吾尔族《石榴花开》以“石榴籽精神”展现团结意象。舞蹈语汇超越形式界限,成为文化精神的象征体系。当下的民族舞蹈已在历史传承、现实观照和精神表达三个维度构建起完整叙事体系。

说起民族舞,人们常用“民族舞是历史的存档”来形容它,那是因为舞蹈中记录了各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信息,如劳动场景、生活习俗、传说故事等,保留着历史的基因。事实上,民族舞蹈并不是简单再现历史记忆,而是借助肢体语言的动态表现以及情感内涵,搭建起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叙事载体。这种源自特定地域文化土壤、扎根日常生活实践的舞蹈艺术形式,既承载着民族集体记忆,也反映着当代社会经验。

舞蹈最初发源于祭祀仪式,呈现了先民对自然力量的崇敬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探寻,这在今天的民族舞蹈作品中仍有体现。如傣族舞蹈《雨祭》表现的就是佤山寨子里男人们向雨神求雨的场景。我们熟知的土家族舞蹈《摆手女儿家》,作品借助“摆臂顺拐”的身体语汇,留存了山地民族祭祀舞蹈的原始韵律。这种同手同脚的运动方式,正是对山地民族适应生存环境的艺术性表达,也是民族舞蹈对民族文化记忆的生动展示。

然而,民族舞蹈的历史性特征并非

凝固的静态呈现,而是具有一种持续生成的文化动能,是通过肢体语言对民族文化进行创造性演绎,这种创造随时代而变。换句话说,舞者的肢体语言构成了当下与历史对话的途径,造型语言也一样承载着文化基因的当代转变。民族舞蹈把静态的历史遗产转变为动态的审美体验,让文化记忆突破文字叙事的限制,凭借肢体韵律和情感表达融入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艺术实践不仅可以保存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还以审美创造的方式给予当代社会精神滋养,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民族舞蹈强大的生命力源自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精心提炼,其本质是生活经验的艺术化表达。例如,蒙古族舞蹈《战马》借助舞者充满张力的动态造型,成功塑造出“人马合一”的审美意象,把力量与忠诚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符号。作品的艺术价值并非体现在技术层面的速度展示上,而是借助“精神骑手”这一意象,实现从具象生活到抽象精神的审美升华。在藏族舞蹈《阿嘎人》的创作过程中,编导对传统劳动动作“打阿嘎”进行了艺术化的拆解与重新构建,依靠群体舞者富有韵律的动作,既保留劳动本身的节奏特点,又赋予其全新的审美内涵。这种创作手法并非简单再现民俗,而是对劳动尊严的诗意重塑。朝鲜族舞蹈《谷雨》以当代审美理念对朝鲜族传统文化中“谷雨”时节的生活场景进行了全新的视觉诠释,创新了民俗小鼓舞的呈现方式,将小鼓与鼓棒意象化为劳动工具与秧苗,以描绘出一幅唯美动人的民俗画卷。少女们轻盈灵

动的舞姿呈现出了农耕生活的诗意,又蕴含着坚韧的生命力。

民族舞蹈在将生活经验升华为艺术审美的过程中,并不仅仅追求形式的美感,还着重于实现精神内涵的延伸。舞蹈家凭借肢体语言的韵律重新构建、塑造生活秩序,在对呼吸节奏的掌控中赋予生命新的美学尊严。如朝鲜族女子双刀舞《冬》中,舞者在极简的舞台空间内以极富张力的呼吸控制,艺术地呈现了“静默中的坚忍”这一主题。演员手中的双刀穿梭于光影中,在蓝白相间的舞台灯光中营造出时间停滞的视觉效果,其艺术趣味并不只停留在对季节特征的简单描绘,而是借助沉静内敛的肢体语言完成对心灵世界的深度探寻。再如,维吾尔族舞蹈《石榴花开》以“石榴籽精神”作为创作核心,作品中铃鼓的清脆响声艺术地呈现出各民族心灵共鸣的和谐画面,女性舞者柔美且有力的肢体表达,将“团结”具象为富有感染力的身体语言。

当下民族舞蹈的艺术形态不再局限于单一文化表征,审美范式正从“民族性再现”转变为“时代性表达”。其舞蹈语汇超越了形式风格的界限,成为文化精神的象征体系,民族舞蹈不再简单依附传统,而是借助动作韵律激发情感共鸣,使传统文化在当下语境中获得新生。可以说,当下的民族舞蹈已然在历史传承、现实观照和精神表达这三个维度构建起完整叙事体系,这种艺术形式通过对民族文化记忆的创造性转化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审美回应,折射着时代的价值取向。

据《光明日报》

